

北宋时期儒学成为主导价值观体系的条件

简满屯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为辅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佛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不以特定时间段为范围,不以特定群体爱好为标准,从最终影响力来说,能称之为主导社会价值体系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对佛教的管制和教育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民间教育的成就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儒学的地位。从庆历新政开始的改革引发了文学家对于儒学复兴的自觉;熙宁变法时期,北宋五子等哲学家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理论活动,完成了儒学吸收佛道精华和自身建构的过程。

关键词:北宋;儒家;佛教;道教;科举;教育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1-0036-05

北宋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导价值观完成了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加之其政治上固有的优势和士人的努力等,成功完成了对佛道的融合引领。本文将根据相关文献,探讨儒家思想成为主导价值观的条件和过程。

一、制度性的保障

(一) 加强对佛教的管理

北宋皇权阶层奉行儒释道并存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任其发展,而是进行差别化管理。总的来看,北宋兴建多所道观,刊布道教典籍,对道教大力扶持。道教在北宋一直处于被保护发展的状态。虽然皇帝们提倡,民间需求,士人学习佛教,但是并非任其发展,而是限制在一定的管理范围内。佛教之所以被管理,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原因。

第一,政治方面。佛教在自身发展中产生了一些直接对抗儒家和道教的内容,形成了直接的对抗

之势,破坏了三教并存的格局。政和八年,颁布诏令,将六千卷佛经中含有诋毁儒、道的内容进行清理,焚毁了其中的9卷(《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四·道释下》之“老子升列传之首在京神霄宫刻御注道德经御笔手诏”)。少数民族政权也利用佛教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如契丹曾派间谍进入五台山(《长编》卷一七一,至和元年九月丁亥)。

第二,经济原因。北宋时期佛教得到很大发展。真宗时期,僧人达五十万(《宋会要·道释一》之一三)。徽宗时期,在寺院中的僧人、行者以及为寺院种地的人员总数达到百万(《襄陵文集·卷四·论释氏扎子》)。这样庞大数量的人数集中在寺院里不仅容易形成管理的真空,还使国家收入减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北宋对佛教采取了相对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禁止夜间进行宗教活动,禁止民间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又如,对僧人进行户籍管理,并限定寺院的僧人数量。这样对佛教进行严格管理不仅在思想上限制了部分佛教徒对主导价值观的攻击,还维护了三教并存的局面,保证了北宋

收稿日期:2014-0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ZDB003)

作者简介:简满屯(1975-),男,陕西蒲城人,哲学博士研究生。

正常的思想秩序。

(二) 国家教育体系的推动

国家层面的国学、州县学,都是把儒家经典放在教学的重要位置。为了倡导教育,皇帝们高度重视大力推崇儒家,有的亲自光临太学示范天下。建隆二年(961),太祖吩咐聂崇义修《三礼图》,经尹拙、窦仪订正后颁行,这是公开运用政治权力建构价值体系的开始。建隆三年(962),太祖命令修葺国子监,塑绘先圣、先师之像,亲自撰文称赞孔子、颜渊,命大臣分别撰写余赞,自己还多次视察,用自身行动来昭示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太宗不仅改革教育,还修撰文化典籍,保存传播了儒家价值体系的载体。太宗妥善对待南征北战中收得的三万三千余卷书籍,重建三馆;选拔大批文臣担任馆阁之职;鼓励各地献书,编成《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并赏赐各地寺院和道观,编印翻译佛经等。在国家层面推行儒家思想,让士子们的头脑完全接受儒家思想的价值标准,为北宋价值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国家教育体系中也具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老师,推动了儒家思想体系的传播。如,胡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景祐初被朝廷召用,只有任教太学。“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也”。石介更是“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并作《庆历圣德诗》,指点当朝士佞(《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十五、卷三十四,《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如此之老师,严于律己,言传身教,举手投足之间,循循善诱之中,道德之学思想已为学生接受。学生悟所授之术,叹受者之德,术德辉映,岂非盛矣?

北宋时期的教育系统对价值体系的形成起着基础性作用。大量承载儒家价值标准的思想文化通过教育进入士人头脑,形成了对佛道等非主导价值观的防御性思想体系。这些人通过科举等方式进入决策层后,把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体系带到了政治生活中,影响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国家运转,间接扩大了价值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主导性价值体系的形成。

(三) 科举制度的推动

如果说教育系统是北宋价值体系形成的基础,那么科举的大力推广则成了推动儒学价值体系进入政治体系的保证,其中的中介是大批士人。纵览北宋、南宋乃至中国整个历史,可以发现宋朝士人对政治的热情和投入是空前绝后的,这种状态的出现始于北宋初期的科举制度改革。

太祖对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大臣可以向知贡推荐举人的做法;禁止知贡举和新进士结成座主、门生的关系;对公卿大臣的子弟实行复试;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并设置多名权同知贡举;实行殿试、唱名之制;对试卷实行封弥、誊录;严格防止举人舞弊等措施^[1]。皇帝们对科举改革亲历亲为,其行为可以用求贤若渴来形容。开宝六年(973),太祖亲自在讲武殿复试举人,从此殿试成为常式。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兴文教、抑武事,大增进士,诸科录取人数达到五百人,不仅开辟了宋朝崇尚文士的风尚,还给自己的统治广纳贤才,增加力量。

从科举本身来看,宋朝政权选拔优秀士人进入政府,是为了贯彻重文抑武的政策,这样士人参政既可牵制武臣,又能壮大自己的力量,“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成了宋朝家法。从价值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取得来良好的效果,给朝廷选取了诸如吕蒙正、张齐贤等大量优秀的行政人才辅佐朝政。在真宗朝时,各种人才已经通过科举制进入朝廷,成为政务治理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在重要的政治位置上直接或者间接地传播儒家思想,并把儒家价值标准体现在国家管理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做法促成了北宋主导性社会价值体系的形成。

(四) 民间教育的倡导

北宋时期,民间层面的教育形式主要是书院,书院教授的也是儒家思想。如,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阳,其“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当时,山东的很多学生,自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忠实于儒家思想的教师自然教出虔诚的儒家信徒,师脉所至之处,广布德泽的背后是儒家价值观的流传。另外,北宋时期的书院往往有一定的田土之赐,使书院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看,北宋时期国家制度要维护的目标是以德为核心的主导价值观体系,制度运行的标准也

是将道德作为价值标准参照,所以北宋时期的相关制度保障了主导价值观体系的生成。

二、儒释道内容消解和重组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规定限制了佛教的活动范围,保证了儒家思想发展的空间,让儒家价值体系能有保障对抗佛道二教的挑战,那么佛道思想中对于儒家思想具有挑战性的内容,却不是靠制度能彻底解决的;而是随着北宋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儒家思想学习、吸收佛道思想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在互动、吸收、构建中逐步完成的。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

第一,宋初前80年左右,也就是太祖、太宗和真宗时期,致力于构建中央集权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在文化政策上对儒释道三家都相对宽松。中唐以来韩愈、李翱对佛道的排斥并没有在更大范围传播、扩散。这一时期科举制逐渐完善,重新修订了《论语》、《孝经》、《尔雅》的注疏,刊刻唐朝的《九经正义》,科举取士还是用《九经正义》作为标准,在考试的内容上基本延续了以前的内容。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主导价值观体系和非主导价值观体系都处于发展培育的阶段,各自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壮大,没有形成公开的冲突。

第二,庆历前后,北宋的各种政治和管理制度已经显示出弊端,同少数民族的战争以及带来的经济压力让朝廷疲于应付,再加上内部的农民起义等问题,逼迫朝廷开始考虑问题到底在哪里,并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庆历新政就是这样走上了历史舞台。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行新政,引起了吕夷简、高若讷等人的反对。于是,一场围绕君子、小人的辩论展开,士林风气为之一变。正如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所言:“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文集》卷十。)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们主要在经世致用方面用力,批判五代以来的文风和时风,在针砭时弊的文风中抒发政治热情,这种批判精神带动了一大批人共同致力于这一事业。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就属于这个群体。他们把对时政和儒学的批判精神扩大,延伸到对佛道的批判,从而揭开了儒家对佛道核心思想的互动序幕。李觏曾说:“浮屠以不杀为道,水饮而蔬食,举世称其仁。夫鸡豚狗彘,待人

而后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种类,一日无人,则饥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爱其资,豢而畜之者,用于其家故也。神灵之祭,宾客之奉,于是乎取之。今且使民无摇手于其间,则阿侍而粒之哉?吾见其无遗种矣。抑将不杀其身而绝其类乎?仁者不为也。抑将夺人之食以饱无用之禽乎?仁者不为也。呜呼!浮屠之仁欤,止于是而已矣!”(李觏《潜书二》)李觏认为,饲养鸡、猪、狗的目的就是为了食用。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家禽才能繁衍,如果奉行不杀生,就会真正让他们绝种,这才是真正的不仁。李觏还对佛教的鬼神论、灵魂转世论等进行了批判。李觏认为,人、物、禽兽是不同的,三纲五常规定了三者的秩序。佛教的鬼神论和转世论等于赋予他们平等,是一种空洞的说教,站不住脚。

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式人物,批评《五经正义》中的讖纬之术,写有《易童子问》怀疑《易传》作者,还在《毛诗正义》中表达了对汉儒的怀疑。他不同意对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手段,主张“修其本而胜之”。他的主张实质是指要推广儒学,用传统的思想战胜佛教。相对于韩愈等人的排佛思想,这样的见识超过了前代单纯的攻击式卫道,影响深远。

胡瑗在《周易口义》中不认同王弼和孔颖达的注疏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几乎是对汉唐各家注疏的直言批评,号召儒生们重新回归六经。石介写了《怪说》、《中国论》等文章,排斥杨亿的“西昆体”,还自己排列出道统谱系。胡瑗、孙复、石介属于“宋初三先生”,他们都曾经在太学任教,影响范围深远。这3个人的主张对于太学生们乃至天下学子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

庆历时期的这些活动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义传》)可见在这一时期,唐末五代的士风正在改变。总的来看,庆历时期的儒生们主张恢复儒学,排斥佛道。他们恢复的方式是重新阐发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否定前代的注疏。他们中的部分人曾经身处北宋政治教育等领域的领导位置,而且自身具有君子风范,人格力量和思想影响深远。

政治改革带来风气的变化,让一大批儒学人物团结起来,形成了复兴儒学的新潮,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佛道的思想形成了回应,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互动的序幕,但是这一切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并没

有触及到佛道思想的深处。如同集合人马兵临城下形成合围之势,至于破城杀敌还要下一番大工夫。所以,在这一阶段儒家道德价值观体系已经逐步建立,而佛道只是继续发挥思想优势,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更没有扩大影响。

第三,庆历以后。如果说庆历时期的复兴儒学运动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是从情感和形式上主张恢复儒家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佛道思想中直接挑战儒学的核心部分,那么这一状况到了熙宁变法开始改变。当时的朝野并不是争论要不要改革,而是争论怎样改革,围绕这一命题分成了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两大集团。除去政治思想上的直接交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说明各自的正确性,出入佛道,有所发明,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间虽有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之分,但在排斥佛道方面是一致的,在奉儒家道德之学为正统方面也是一致的。在这两个一致的前提下,他们各自发明本体,构建理论系统,吸收佛道精华,让存在的统一性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让作为核心价值系统的道德范畴从日用人伦贯通到宇宙社会的秩序,实现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统一。因此,尽管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的具体主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讲儒家道德之学完成了革故鼎新,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周敦颐的学说提出了太极这个本体,破除了佛教本体空无的主张。他的《太极图说》中提出了“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结论。《通书》中提出了以“诚”作为中心范畴架构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是由宇宙观到伦理学的逻辑结构,这正是周敦颐被尊为宋明理学开山鼻祖的道理所在^[2]。他的主张被后世的学者继承,成为道德性命之学的重要概念。

邵雍的学说博大精深,他的象数学参考了道教的思想,但是范围远比原来的解释广阔深远,涵盖了人生、自然、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变化。这样体系严密的学说属于儒家思想阵营,也在客观上说明道德之学在形式上也有新颖之处,更有宽阔视野,远非佛道之生死成仙所能涵盖。这样就对佛道二家的存在形成了一定的动摇。

张载的气本论思想,用气这一本体贯通宇宙,认为天地人有机统一于气,气的分散聚合形成了万物;还提出了民胞吾与的思想。这个主张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角度回应了佛道二教关于世界虚无的主张,让社会伦常有了合理的依据,在根本上让儒学核心价值观开始挺立起来。

王安石的新学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位置。他对于

传统社会秩序的永恒性论证是靠《洪范传》完成,这样也在客观上破除了佛道对世界本源的虚无主张。他在《洪范传》中说: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故“次三曰农用八政”。通天下之志在穷理,同天下之德在尽性。穷理矣,故知所谓咎而弗受,知所谓德而锡之福;尽性矣,故能不虐菟独以为仁,不畏高明以为义。如是,则患者可诱而为智也,虽不可诱而为智,必不使之拙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为贤也,虽不可革而为贤,必不使之困贤者矣。夫然后有能有为者得盖其行,而邦赖之以昌也^[3]。他认为宇宙万物具有一个同一的本原。穷理是了解本源的途径,完善个性也是把握德性贯通本原的途径。穷理和尽性可以使众人改变自身,进而实现国家的改变。显然,王安石的新学也是用完整的思想体系构建了儒家道德性命之学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从王安石新学成官方学说,也就是从宋神宗时期开始,王安石学说基本上都是处于统治地位。直到南宋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说,王安石的新学才逐渐失去官方的正统影响。这样就保证了儒学思想在官方层面能成为科举的标准从而影响深远;也在政治层面让儒学思想处于重要地位,推动了主导价值观体系的建立。

二程的学说中,理本论是对佛教虚无论的具有影响力的回击。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4]。程颐说:“万物皆只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程颢认为修养要靠定性,程颐认为要靠“主敬”、“格物穷理”。虽然他们提出的把握理的方法不同,但是在本体论的主张上完全相同。这种本体意义上的主张构成二程哲学的核心概念。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和佛道二教对抗的基点,而且理的普遍化也形成了自然法则和社会秩序,在说明社会运转方面自治性更强,让三纲五常的秩序更加合理,对抗了佛教的因果和转世说。另外,二程的学说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门下弟子众多,张载去世后部分弟子也投入其门下。可见,一种思想能广泛流传,除去自身具有的合理性内涵,也和学习这种思想的人数和影响有关。

司马光虽然主要以历史学见长,但是也在本体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用三十多年时间研究杨雄的著作,写出了《太玄集注》、《法言集注》、《潜虚》等书。《潜虚》曰:“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

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者,时之遇也”,“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终则返于虚矣”^[5-6]。“虚”和张载“气”说相对立,但是也属于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解释世界的构成,破除了佛教的空和道教的自然。当然,司马光的“虚”并不是完全否定佛道,也有融通的成分。“或问:‘老释有取乎?’迂叟曰:‘有。’曰:‘何取?’曰:‘释取其空,老取其无为自然,舍是无取也。’或曰:‘空则人不为善,无为则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谓其然也。空取其无利欲之心,善则死而不朽,非空矣。无为取其因任,治则一日万几,有为矣。’”可见,司马光主张儒释道融合,但是这种融合是站在儒家立场的,也是吸收佛道二教的精华,丰富发展儒家思想之举。

三、结语

总之,这一时期以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为主要事件,引发儒学复兴,推动了哲学思潮变化,出现多种流派、儒学不断繁荣的现象。无论是周敦颐的太极论、王安石的气一元论、张载的气本论、二程的理

本论、司马光的“虚”本论,都破除了佛道二教的虚无本体主张。不论义理之学还是性理之学,都主张通过精研义理或者完善德性而实现个人德性圆满。

主导价值观和非主导价值观,从北宋初的对峙发展,经历庆历时的开始互动,终于走到了最后的学习、吸收、消解、重构的阶段。经过这样的过程,儒学开始挺立起来,儒学主张的道德也更加深入人心。佛道等非主导价值观就是在和儒家的互动发展中逐渐被政治上边缘化,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也成为了主导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 何忠礼. 宋代政治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2]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三联书店,2009.
- [3] 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 唐武,标注.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4] 程颢,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 黄宗羲. 宋元学案[M]. 全祖望,补修.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M]. 沈善洪,吴光,编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Conditions for Confucianism as dominant value system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JIAN Man-t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main value system, with Buddhism and Taoism as the subsidiary systems. Although Buddhism had political support to some extent, but if a specific time was not considered as a period and a specific group's interests as a stand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w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dominant social value system was still Confucian moral value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regulation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folk education guaranteed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ystem level. The reform starting from Qingli caused writers' sense of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Xi'ning reform period, the theoretical activities of the philosophers such as five scholars, WANG An-shi and SIMA Guang et 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mpleted the process of Confucian absorption of Buddhism and Taoism essence and Confucia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imperial examination; education